

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

黄 旦

(浙江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推动、指导报刊朝职业化方向发展,是五四前后徐宝璜、邵飘萍等人研究新闻学的主要目的,因此,报业组织及其运转,是他们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提供新闻是报业的天职;为全社会服务是报业的目的;经济独立是职业化报刊的基石;言论自由是职业化报刊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些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报刊实践,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在新闻研究中的体现。

[关键词] 五四运动;新闻思想;报刊职业化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0)04-0005-09

A Review of the Journalistic Thoughts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HUANG Dan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s made by Xu Baohuang, Shao Piaoping and others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all pointed toward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spapers. As a result,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newspapers became their focus of attention. They proposed many influential views that take news reporting as the sacred mission of the newspapers, the service of the community as their goals, the economic independence of the publishers as their basis, and freedom of speech as their life environment. All these views wer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in their time. They are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func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al ideas popular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 words: May 4th Movement; journalistic ideas;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newspapers

五四前后,在中国首次出现了一批我国学者自著的新闻学书籍,比较著名的有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蔡元培先生曾对徐宝璜的《新闻学》有过很高评价,称为“破天荒”之作^①。蔡先生的“破天荒”是指该书是由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学论著,恰如后来《京报》所言:

《新闻学》以前中国无专门研究新闻之书籍,有之自先生始,虽仅五六万字,以言简赅精当,则无出其右者。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有不可抹灭之价值,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他无论矣。^②

这样的看法和评估,得到后来者一致赞同和继承,由此成为目前评价徐宝璜及其新闻学研究的通用框架^③。这当然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然而,如果换一种视野,仔细追究一下徐宝璜的基本

①有关蔡元培先生的评价内容请参见《新闻学·蔡序》,引见徐宝璜的《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此段文字引见黄天鹏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所作的序言,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③有关这方面的书很多,最近的则有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收稿日期] 2000-03-28

[作者简介] 黄旦(1955-)男,浙江乐清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新闻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及新闻传媒与社会方面的研究。

思想，并且把他的《新闻学》和与之同时的其他新闻学论著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那么，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破天荒”之举，就不仅仅在于开启并且创立了中国的新闻学，在更深层次上，它还昭示了另一个“破天荒”的意义：第一次触及和研究中国报刊的职业化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个关于新闻职业化的思潮。

—

众所周知，中国关于报刊的认识和论述，并不始于徐宝璜们。远的不说，上个世纪末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梁启超们，就对报刊做过诸多的阐发和论述。然而，梁启超们的报刊实践和理论的中心，是“报馆有益于国事”^①，恰如梁本人所说，《时务报》之初衷在于“哀号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譬犹见火灾而撞钟，睹入井而怵惕”^②。《清议报》则是要“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历国耻”^③。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不仅使得报刊为变法维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推动并掀起了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个思潮——报刊是政治宣传喉舌的思潮^④。

徐宝璜们则全然不同。徐宝璜以为：

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业者也。斯学昌明，则人类受新闻事业之福，愈增其量，是斯学之重要可知矣。^⑤

邵飘萍对此同样是直言不讳：

以我国之社会，欲以新闻为职业，乃有时较他国为难。盖我国之各方面固未认识新闻记者之地位为如何尊严，政府中人殆尤甚也。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矣。^⑥

由此不难看出，徐宝璜们的出发点是新闻学和新闻职业的关系。研究新闻学是为指导实践、培养记者，使中国报业能向着职业化方向发展。的确，梁启超的“报馆有益于国事”之呼喊，有着为报纸正名的目的。据悉，其时“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⑦。梁启超试图通过报刊对于“国事”的重要意义，唤起社会以及办报者自己对于报刊重大使命的认识，重塑报刊的社会形象。徐宝璜们同样有“欲救其弊”，导人正确认识报刊及记者之目的。不过，他们是从职业报业的角度来强调记者的地位及其对于社会的作用的。可见，两者在新闻学研究和理论阐述的背后，深藏着截然有别的基本思路。

在徐宝璜们看来，“人类文明愈进步，则事业愈见其繁复，于是不得不分行业之法”。因此，报纸成为一种职业，乃社会发展之必然。现代社会，人与人交际日益频繁，社会关系至为复杂，社会事实瞬息多变，人们要适应环境，一方面需周知时事，对社会情状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天下太广，人事极繁，分散四处却又难以尽见尽知，遂就有了报业^⑧。不仅如此，新闻业自身同样也是按循此种分业之法，形成了“生产、分配、消费”等等部门；内部分科组织，阶级繁复而井井有条^⑨。

按此所见，徐宝璜的《新闻学》把所要研究的新闻纸的诸种问题，具体化解为“编辑、组织、营业”三大部分，就不是偶然的。推其本意，怕正是要探讨并勾勒一个职业报业组织的运转、结构及其主要面貌特征。此时的另一本新闻学专著，即任白涛所写的《应用新闻学》，其大致体例与徐著相同，

^① 关于梁启超等维新改良人士其时的新闻思想，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的观点：“由于他们政治家的身份和办报活动的性质所决定，他们的办报思想主要集中在政治报纸的宣传功能、宣传手段以及对报人的要求等方面”（见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史》第159页）。只是需要补充的是，其中心问题是报纸的宣传功能，后两者均与此相关联。

^② 参见徐宝璜的《新闻学》第15页，同时可参见《新闻纸与社会需要》，见徐宝璜的《新闻学》第118页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0页。此外，还可参见戈公振的《新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报纸的将来》一文见黄天鹏所编的《新闻学演讲集》，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第62页。

只是多了一个描述报纸史略的附编，邵飘萍原有一个系列的新闻学书籍写作计划，包括：总论、采集、编辑及广告和发行。从其选题来看，似也未超出徐宝璜的“编辑、组织、营业”之三部分。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着重在于对中国报刊历史的总体概括，体例稍有殊异。即便如此，他仍未忘记在最后的总论部分中，从历史到现状，就报纸的组织、内容、编辑、发行等等方面，一一加以略述^①。这种思路，分明与徐宝璜们类同。难怪戈公振认为，所谓的报学史，实质上就是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的学问”^②。

在今天看来，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一批新闻学著作在结构上有庞杂之嫌，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重要信息，即它们对于报业——作为一个职业组织，作了较为全面的描绘、研究和归纳。稍后的潘公弼就曾有过一个演讲，全面地阐述作为一个职业化报业组织所应具备的结构和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就结构而言，分为“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要使这三个部分配合默契，成为一个统一、协调、健全的组织，尚需五个条件：报馆职员，须能充分地联络、分工和合作；报馆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识；报馆职员，要尊重个人之个性；报馆中的三大部门，须充分联络；要让报馆成为一个“有机体”组织^③。这也许是那一时期关于职业报刊组织及其运转的最为具体和详细的文章。如果根据该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回过头再来看徐宝璜、邵飘萍们论著的基本构架及主要精神，就可发现，不仅其内在脉络几乎一致，而且更能充分理解并体会他们的总体思路和命意之所在。

关于该一时期有关报刊职业化的思想和实践，曾引起一个外国学者的注意。他说，民初以后，许多中国报人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构建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专业性的客观中立，以便在报业难以避免的党派性和政治性中安身立命。他并且把此种观念的变更追溯到了黄远生。其依据是黄远生在为《庸言》所写的《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提出“吾曹以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这显然是要求以事实为主，要综合事实来下判断，而不是恃理想来发挥空论^④。此段话值得讨论之处似还不少。比如，转变的是否就是客观中立之观念？个中渊源是黄远生还是可以追溯到更远？客观中立作为报刊的一种职业意识形态，于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逐渐兴盛并得以被普遍承认^⑤，中国的国情及其报刊实践与之异殊甚大。现把这个作为衡量中国报刊职业化的惟一标准，是否符合中国报刊发展之实际？更为糟糕的是，这位学者认为，中国报刊的职业化转变仅仅还停留在观念上，而不是在实践中已有所反映和体现。别的不说，单是五四后上海“申、新”二报向现代企业化报业的发展趋势，这在我们任何一本新闻史著作中都早已是历历在目^⑥。尽管如此，这位学者把民初之后的新闻思想纳入到职业化层面来进行认识，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这也正是我们的新闻史和新闻思想史著作多年来不够重视或重视得很不够的地方。的确不能否认，在后来的整个发展中，无论是“职业化”的报刊实践，还是“职业化”的报刊思想，都不是也没有成为我国报刊和报刊思想的主流。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也不能忽视它们所曾具有的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

二

徐宝璜对于报业，思想上有一基本之定位。这就是：报纸者，社会之耳目；访员者，又报纸之耳。

^① 戈公振不止在《中国报学史》的总论部分对此作了阐述，在他的《中国报纸进化概论》（见《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79 年版，第 8 页）中，对此问题也有同样的论述。

^②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 Michael Schudson(1973).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 Basic Books , Inc. Publishers.

^③ 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5—80 页）中，有对这方面的情况的介绍，可资参考。

目也^[11]。这一观点深得邵飘萍的赞同。邵飘萍以为,报纸、记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是“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人类各种新事实之表现,皆难逃耳目之鉴察,其取作材料,载诸报纸,发为批评,则犹之耳目以新闻见者转达于脑府。无耳目,则脑府顿失其功用……^[12]任白涛也说:“盖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倘社会没有报纸,就好比是人自己“窒其耳,闭其目”,成为一个“聋聩之社会”。因此,轻视报纸;殆与不解聋聩之苦痛,而轻蔑自己之耳目也,无以异耳^[12]。诸如此类的说法,很自然使人想起梁启超在《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早就说过的话:“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然而,表述上的相近却掩不住立足点的根本差异。首先,梁启超所针对的是中国政制之“上下不通”、“内外不通”,徐宝璜们则着眼于全社会的信息交流,“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13];世之览者,遂皆能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可矣^[14]”。其次,梁启超式的“耳目”、“喉舌”,一开始所要传达的是“上之举措”、“下之苦患^[15],后来则是要“主持清议,开发民智^[15]”,徐宝璜们自始至终,强调“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报纸之价值有无大小,与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真确与否,有最密切之关系^[16]”。最后,从办报实践和思想轨迹看,康、梁们大致是沿着党报和政治机关报的路线行进,虽然梁启超后来也有过“国报”的想法^[3]。徐宝璜们可是始终认为,报纸不是归谁专有,而是属全社会并为全社会服务的,“社会各级人士,无论贫富贵贱,几无不以阅报为每日必要之行事而不能一日或缺”,报纸“几如布帛菽粟而为世人生活上必需之物^[14]”。

耳目者,不过观察、追寻、打探消息而已。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第一个职业特点,就是要“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16]”。用邵飘萍的话来说,要“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17]”。人人皆知,梁启超们的报纸是以“言论”胜。据计,仅出69期的《时务报》,单是政论文章就发了133篇,其中属梁启超个人所撰的有60篇^[17]。就是这些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可是,梁启超深信不疑且行之有效的办报模式,遭到了徐宝璜们的否定。戈公振认为,发表言论是杂志的任务。按照这位新闻史学家的考察,报纸与杂志在一般情况下,之所以同时并称且都归之于定期刊物名义之下,乃在于两者的形式内容及对于社会的作用,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社会未进化的时代,两者更是混淆在一起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报纸、杂志的心理需求发生了变化,报纸与杂志的区别日益明显。此种区别,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在于外观的差异:如报纸是折叠的,杂志是装订的,也不是刊期数量的问题,像杂志在一定时间内发行的总次数比报纸少等等。其根本差异在于本质特性,即“原质”上的不同;报纸以报告新闻为主,而杂志以揭载评论为主^[8]。由此就不奇怪,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虽然把《时务报》搁在“民报勃兴”一章中,但却是放在“杂志”一节中加以讨论的。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任意为之的。依笔者之见,此地“民报”之含义,是指民办的“定期刊物”,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报刊”。而《时务报》之所以是“杂志”,就因为它在“原质”上是以论说为主。这样的分析若不牵强,那么《时务报》在戈公振眼里,压根就不是报纸。

既然如此,职业化的报业以提供新闻为天职^[11],就不是人为的设定,而是报纸这一“质”的规定性所决定了的。“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18]”,构成报纸之最重要的原料厥惟新闻^[7]。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没有新闻,也就没有报纸,自然也就不存在报纸这一行业。难怪乎邵飘萍要以“新闻”作为衡量报纸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

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四十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朝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

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7]。

当然，这决不是说徐宝璜们认为报纸不需要言论。邵飘萍的《京报》之所作所为，已是众所周知。按他自己的说法，《京报》言论题材广泛，“不独政治问题，外交教育与夫社会上之种种事业”，均在其言论范围之内。“出版不数月”，“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19]。戈公振以为，报纸除了报告新闻，还需揭载评论^[13]。徐宝璜不仅强调报纸还是“国民之喉舌”，甚至提出，一部分报纸可以“赖罄吐公众情感与愿望而产生和存在”，“一面供给世人以发表意见及互相讨论之机会，一面复自行提供意见，以供世人采择，发挥民意，以督责政府与社会”^[14]。

问题的关键不是报纸上有没有或要不要言论，而在于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就本体意义上讲，言论不是报纸的“最重要原料”，发表言论更不是报纸具第一位的任务。为此，戈公振特意考察了报纸言论的发生机制和过程，最后的结论是：“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色，乃附带而生者也”^[15]。同样，徐宝璜对于言论，也有两个前提加以限制：一是目的出于言论自由，让没有“刊布之机关”的人，能在报刊上公开表露自己的意见，且也必须是“正当之意见”和“公允之评说”；二是对于“内容常至复杂，利害常至隐晦”的事实，由于“世人每不能判定其是非利害”，因而需有人“为之注明指导”。前者意在发表“舆情”，后者在于“评论时事”^[16]，这与梁启超式的放言高论，所谓“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3]云云，显然不是一回事。

职业化报纸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所具有的公共性。既是社会的“耳目”，就自然不属于个人或团体，而是社会的公共机关。任白涛把“公共性”视为报业的第一特质，是报业与其他事业的根本区别。“彼营利的或名誉的事业，只计及少数人之利害荣辱。而新闻事业，则以大多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报纸是与公众福利有关的事业，“绝对当以公众为本位”。否则，就是“造成一种社会的罪恶者”，是“新闻事业的叛徒”^[12]。徐宝璜则再三告诫：“夙昔执新闻业者，辄以新闻纸为其个人私产，此殊失当。夫吾侪献身于社会时，即当视此身为社会所有，遑论其所执业”。“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惟有如此，记者“布一消息，定力求正确与完全”；凡正当之议论且将予各方面平等发表的机会，记者自己的议论，“亦必诚矣”。不仅如此，徐宝璜还以为，“公共化”是报纸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报纸进步的征兆^①。戈公振认为，公共性来自于报纸自身的特色。一是报纸有“公告性”特点，就是把消息完全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二是报纸又有一般性特点，即其内容要适应多数人的需要。“公告性”是报纸的外观、形式；“一般性”是“公告性”的内容，两者互为作用，使得报纸能够代表多数人，为公众而刊行。所以，报纸的舆论和纪事，均与公告性密切关联。言论理应是国民“公共意志”在报纸上的体现：纪事则不能脱离“公众需要”，因此，“一评论，一纪事，又无往而非关于公众者”。戈公振把上述做法称为记者之“天职”或报纸天职之所在。与徐宝璜把“公共化”视为报纸发展的趋势相类似，戈公振认为，“平民化”、“世界化”是报纸未来的方向^[13]。邵飘萍论及报纸的“公共性”，更多地与言论独立联系在一起。这也许与他自《汉民日报》正式踏入新闻界开始，不断受到大小军阀的压制、迫害，对于言论自由有切肤之痛有关。邵飘萍提出，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公共机关，一方面，在社会上具有与任何国家机关一样的独立平等之地位，任何人不可加以压制，否则，就是不承认言论机关的独立平等地位，新闻界要对此进行抗议^[20]；另一方面，报纸应发表社会各方面不同的思想言论，以使读者扩充其思想和眼界，得到各种参考依据，言论甚至不必与报纸自身意见完全一致^[21]，即便遭到同行攻讦，也不必马上“以牙还牙”。这不仅是因“恶声相加”，争论无法平息，更在于有损报纸公共机关之形象，“报馆或通信社乃社会的公共关

^① 有关论述可分别参见《新闻纸与社会需要》、《新闻事业之将来》、《实际应用新闻学·序》、《新闻学刊全集·序》。以上均见于徐宝璜的《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27、132、107页。

系 非私人争骂之武器^{①22]}。

从任白涛的绝对以公众为本位 到徐宝璜的公共性与报纸的公正、确实和诚信之关系 ;从戈公振的报纸之公告性、一般性 到邵飘萍的言论平等和独立 ,说法不一 ,内中宣达出来的精神却基本一致 :报纸是社会的工具 ,公众的工具。用戈公振的概括 ,就是全社会“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②23]}。正因为如此 ,他们认为 ,作为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 ,必须具有一定资格。戈公振说 :“医生、药剂师 ,因为人命关系 ,所以要受科学的训练 ,就是兽医也有如此的规定。但是新闻记者 ,若是并不曾证明他的知识已经成熟 ,就交付他一个更宝贵的生命——一个国家或许许多国家的生命 ,这是极不合理的^{③24]}。同时 ,徐宝璜们还认为 ,这种“资格”并非天生的 ,必经种种繁复之准备^{④25]}。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渠道 就是经过学校 尤其是大学的教育。对于一个以为社会服务为宗旨的职业化报纸而言 此举尤显必要和重要。戈公振明确指出 我们对于新闻记者的大学教育 ,不仅以为“可以”就够了 ,且应该以为“必要”。设若我们报纸当作代表一个团体利益看待 ,或是政党 ,或是教会 ,如此 ,新闻记者只须熟悉此一个团体的情形和流畅的文笔就够了 ,大学教育可以不必要。但是我们若认为报纸是代表公众的利益 ,那就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闻记者才能胜此重任^⑤。就是在这样的新闻职业化思想推动下 ,中国大学的新闻教育终于启动 ,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也因之显露端倪并初结成果。套用一位后来者的说法 ,中国由此开始了“新闻职业化与科学化^{⑥25]}。

三

然而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 ,要走职业化报纸的道路谈何容易。对此 ,徐宝璜的态度是含含糊糊的 :“新闻纸为社会产品之一 ,故亦受社会之支配”。言外之意 ,社会环境良恶如何 ,自对报纸发展会有重大影响^{⑦16]}。戈公振是一针见血 ,矛头直指军阀统治 :报刊“经洪宪复辟之祸 ,受年年军人利诱威胁之蹂躏^{⑧13]}。邵飘萍则是全面总结 ,举其茕茕大者为四 :一是教育不普及 ;二是交通不便利 ;三是政治不良 ;四是实业不发达^{⑨26]}。实业不发达 ,报纸的经济支撑缺少扎实基础 ,政治不良 ,报纸的自由度大受影响。至于教育和交通 ,会直接牵涉报纸的销售和发行 ,而这又与报纸经济息息相关。所以如归纳一下 ,上述种种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大问题 :一是报刊言论能否自由 ;二是报业经济能否自立。

关于言论自由 ,梁启超们就已提出过。但他们大多是从政治体制、社会文明的角度予以论述的 ,更多的是出于新思想的输入和启蒙。武昌起义后 ,先后成立的各地革命政府 ,也纷纷出台法律、法规 ,试图确立、保障言论自由之地位。可是 ,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和民主政治之基础 ,这一自由很快被蜂拥而立的政党所利用 ,成为相互攻讦的手段。待到袁世凯上台 ,封压报纸 ,抓捕报人 ,几成家常便饭 ,所谓的“自由”云云 ,早已是面目全非 ,名存实亡。正因如此 ,徐宝璜们对于言论自由 ,是作为报纸能否存在、能否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正常进行运作的外在环境即“生存环境”来看待的。所以他们认为 ,言论自由成为“报界切肤之问题 ,此问题不解决 ,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⑩8]}。“倘政治不良 ,言论莫克自由 ,处处受恶势力钳制与压迫 ,不是封闭报馆 ,便是逮捕记者 ,轻则下狱 ,重则枪毙 ,人人都感到‘邦无道危行言逊’的恐怖 ,谁还肯大放厥词呢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不快 ,职业化进展缓慢 ,都是因为种上了这个因——政治不良^{⑪26]}。

经济是报业之命脉 ,按徐宝璜们的观点 ,没有经济独立 ,所谓的职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 职业化的报业首先要商业化。徐宝璜曾痛心地说 ,中国报业上焉者为机关报 ,以全部售于一人或一

^① 见戈公振的《新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 第 29 页。有关内容还可参见徐宝璜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序》。

派;下焉者,则是甲盛迎甲,乙盛迎乙,依靠下贱之卖身投靠,以求“戋戋糊口之费”,中国报业“鲜有能知商业化之意义”^[27]。戈公振则以为,只有报纸成了商业,才会需要报馆组织^[24]。此即是说,报馆的职业化,与其商业化程度相关。邵飘萍的观点也类似,他认为,一个合格报纸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用纸张印刷;其次必须是定期出版。这两点都属平常,较为特殊的是第三点,叫印刷不待人定。这就有些费解。按邵自己解释,像鞋、衣服等物,都经过了为自己做(即仅为满足自己穿衣所需),为某些特定人做,然后进入是为任何人做,此时就成为了任人购买而无需预定的商品。报纸也是如此,只有变成不为特定人所办,并成为人人可买的商品时,才是完善的,才真正称得上是报纸^[5]。任人所买还是特定人的特权,实际上就是报纸为谁服务的问题。美国有学者认为,为“公众服务”是衡量新闻媒介和其他行业职业化程度的主要标准^[28]。若考虑到徐宝璜们的观点大多来自于西方,那么,邵飘萍的表述显然与此一脉相承。这也就难怪徐宝璜、戈公振、邵飘萍都把“商业化”或以“营业本位”的报纸,看成是报纸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了^①。

徐宝璜们提倡“商业化”本意是通过经济独立推动报业之独立,使之成为不依靠一人一派的社会公共机关。然而,民国后一些报纸的“商业化”带来的,却是卑劣低下、惟利是图的庸俗化。如邵飘萍的《京报》那样的报纸,实在是凤毛麟角。事实上,“商业化”对于报业,怕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职业化”有促进的一面,但不能善用之,也有相当的反作用。这也正是目前世界性的大难题。徐宝璜们对此倒是头脑清醒,于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用“公共性”来制约上。一面是徐宝璜式的谆谆善诱,从道德上予以正面引导,报纸系“私人独立经营或集资经营之物,而非社会之公有,自亦不能无私之一面”。但报纸毕竟是社会之公器,理应以社会之利益为利益,因而必须考虑“如何方能公私兼顾,复不能以私而害公也”^[14]。另一方面,则是戈公振式的报馆公有化之措施。先是由团体报来取代私人办报,然后是达到报纸的公有化,以此“将报纸由私人的机关,变为公共的机关,实行报纸的公有化”^[29]。戈公振的设想,后来似得到了成舍我的热烈响应,并做了更为具体的构想:第一,报纸国有,由国家经营;第二,许可私人经营,但不劳而获大资本家,则应排除在外;第三,社会应成立一机关,监督报纸的言论及对政治、社会的批评;第四,总编辑之进退,也由这一团体所决定,而该团体成员由社会民众团体所推选^[30]。

四

余家宏先生对于徐宝璜的《新闻学》曾有这样的评价:“这本书反映了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前夕,我国学术界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德赛二先生’前的产物,其中很多观点是针对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31]关于五四前后的新闻思想,同样可以做如是观。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新闻业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旋即因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军阀摧残,落入了低潮。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台,首当其冲遭受厄运的就是报纸。为躲避和生存,也有的为争权和夺利,报纸或噤口结舌,或参与党派、自找靠山。梁启超式的政论报纸不复存在,人们了解新闻的需求,则因局势动荡而愈加迫切。可是报纸的总体状况令人失望和担忧。有人做过如下的概括:一是“议论与事实不相分离,好逞不衷事实不着边际之空论,复不知注意新闻之采访”;二是“一方面虽受政府之压迫箝制,而不能得言论之自由,一方面却具有无上之威权,可以任意污蔑人之名誉”;三是“主观之议论多,客观之议论少,又常以主观之主张,武断客观之舆论,以主观之见解,混淆客观之事实”;四是“因经济鲜能独立,不得不与某一方面,发生某种关系”,于是以“少数人之利益”,“抹杀多

^① 有关内容请参见徐宝璜的《新闻学》,戈公振的《报纸之将来》,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第四章第十七节。

数人甚至一般之利益”，“丧失主张公道之勇气^{¶32】}。此种概括，虽无大错，其重点似还在于那些政治性报纸。实际上，当时还有一类报纸属于戈公振所称的“自好者流^{¶18】}，如不喜党派，以求经济之独立的商业化报纸，但却惟“利”是求，连报纸的基本职业精神都不能守持。捏造专电传假新闻，等而下之者更是内容低下，诲淫诲盗，恰如有人对当时北京报纸所做的概括：剪子、浆糊、红墨，成为报纸的“新闻胆”或“报之素”，剪剪贴贴，“三者之妙用神，斯办报之能事毕矣”。“十而八九者，形式与精神均不成为一种报纸^{¶33】}。如果以此再来看徐宝璜、邵飘萍们的那些具体观点，比如以传播新闻为天职，社会的公共机关，要具高尚的品性等，就全然明白其矛头之所向。

关于五四与该时期新闻思想的关系，这里不可能做出全面的评价，只能粗粗提两点：首先，五四彻底的反传统、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促使徐宝璜们重新认识、批判中国政治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新闻业。其次，五四所高喊的“科学、民主、自由”，所提倡的个人解放、人道主义及言论思想自由、自由政治等，为徐宝璜们研究并创立新闻职业化思想提供了理论武器。恰如任白涛所言，五四运动的勃发，“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34】}”。因此，徐宝璜们关于报纸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报纸与社会、与人生，关于报纸独立等，怕也都有五四这场席卷中国文化、思想、政治、道德等等各个方面伟大的运动的影子。

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35】}”。五四前后的新闻职业化思潮，也正是学者所思和时代要求的结合物。正因如此，当时代要求发生转换时，其所思并成潮者，无疑也要发生变化。恰如五四运动很快从文化层次的“思想启蒙”，转到了社会政治层次的“救亡”一样，徐宝璜们的职业化新闻思想，也很快就被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呼喊所掩盖。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思潮的存在。因为职业化新闻思想，是五四新文化大潮中的一股水流，是新文化运动所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颇为遗憾的是，我们以往的新闻学者们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到该时期的报刊实践和思想如何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上，至多还注意到徐宝璜们对于新闻学研究的开创性意义上，五四运动中的报刊和一些新闻思想之所以还被人记起，就是因为它们曾经是新文化运动和革命的载体。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它们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因之也就很少有人想到，五四时期的报刊实践和思想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们为新文化运动做了什么，更在于它们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什么，为中国已有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添加了或确立了哪些新的“因子”。同时，这些新的因素在我们整个新闻思想史上具有何种之地位，对于我们今天仍还具有何种之意义。正是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写出此文，一是对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闻学先驱们略表纪念；二是希望能抛砖引玉，唤起诸位学者对这一时期新闻思想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20.
- [2]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A].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9.289.
- [3] 梁启超.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A].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6-45.
- [4] 徐宝璜.新闻学刊全集序言[A].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32.
- [5] 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A].邵飘萍.邵飘萍选集(下)[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02,600.
- [6]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A].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258-278.

- [7] 邵飘萍. 实际应用新闻学[A]. 余农宏, 宁树藩, 徐培订, 谭启泰. 新闻文存[Z].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94. 416, 385, 385, 385, 385, 385.
- [8]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5. 1, 4-5, 6, 4-15, 7-19, 360-363, 354, 359.
- [9] 翁公弼. 报馆的组织[A]. 黄天鹏. 新闻学演讲集[C]. 上海: 上海现代书局, 1931. 45-53.
- [10] 特里·纳里莫. 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A]. 徐宝璜. 新闻研究资料(第 58 集)[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178-190.
- [11] 徐宝璜. 实际应用新闻学·序[A]. 徐宝璜. 新闻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07.
- [12] 王白涛. 应用新闻学[M].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26. 8, 5-7.
- [1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自序[A].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7. 41.
- [14] 徐宝璜. 新闻纸与社会需要[A]. 徐宝璜. 新闻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18, 120, 126.
- [15] 徐宝璜. 《清议报》本报改定章程告白[A].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644.
- [16] 徐宝璜. 新闻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4, 111, 119-120, 120.
- [17]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557.
- [18] 戈公振. 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论[A].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Z].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79. 8.
- [19] 邵飘萍. 本报三年来之回顾[A]. 邵飘萍. 邵飘萍选集(下)[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640.
- [20] 邵飘萍. 从新闻学上批评院秘厅对新闻界之态度[A]. 邵飘萍. 邵飘萍选集(下)[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134.
- [21] 邵飘萍. 附刊上言论之完全自由[A]. 邵飘萍. 邵飘萍选集(下)[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170-171.
- [22] 邵飘萍. 愚今始一言之[A]. 邵飘萍. 邵飘萍选集(下)[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352.
- [23] 戈公振. 新闻学泛论[A]. 黄天鹏. 新闻学演讲集[C]. 上海: 现代书局, 1931. 3-4.
- [24] 戈公振. 新闻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29-30, 38.
- [25] 吴贵因. 新闻职业化与科学化[A]. 黄天鹏. 新闻学名论集[C]. 上海: 上海联合书店, 1930. 97.
- [26] 徐宝璜. 中国新闻业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A]. 黄天鹏. 新闻学名论集[C]. 上海: 上海联合书店, 1930. 45-46.
- [27] 徐宝璜. 新闻事业之将来[A]. 徐宝璜. 新闻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29.
- [28] HALLIN D, C.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eds), " Mass Media and Society " [M]. London, New York: A Member of the Headline Group, 1996. 243-264.
- [29] 戈公振. 报纸的将来[A]. 黄天鹏. 新闻学演讲集[C]. 上海: 上海现代书局, 1931. 62.
- [30] 戒舍我. 中国报纸之将来[A]. 燕京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研究[C]. 北京: 燕京大学新闻系, 1932. 7-8.
- [31] 余家宏, 宁树藩, 徐培订, 谭启泰. 新闻文存[Z].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94. 374-375.
- [32] 吴天生. 中国之新闻学[A]. 黄天鹏. 新闻学论文集[C]. 上海: 光华书局, 1930. 19-20.
- [33] 戈午编译社. 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A]. 杨光辉, 熊尚厚, 吕良海, 李仲民.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167.
- [34] 王白涛. 应用新闻学·自序[M].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26. 3.
- [35]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1.

[责任编辑 徐 枫]